

日本政治史

第一卷

〔日〕信夫清三郎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K323.2

11101



2 030 7806 1

日本政治史

第一卷

西欧的冲击与开国

〔日〕信夫清三郎著

周启乾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日本政治史 I

西欧の衝撃と開国

信夫清三郎著

根据日本南窗社 1976 年版译出

日本政治史

第一卷

(日)信夫清三郎著

周启乾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2 字数 299,000

1982 年 1 月第 1 版 198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册

书号: 11188·22 定价: (六)1.20 元

译者的话

本书作者信夫清三郎，1909年生，1931年入九州大学法学部学习，曾受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服部之总的指导，研究日本外交史，并于1934年出版《中日甲午战争》一书，揭露了日本资产阶级和军阀政府的反动本质，当即遭到日本法西斯政府的禁止。

1934年大学毕业后，参加了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术团体唯物论研究会，从事进步文化活动，参与编辑《历史科学》、《历史》等刊物。1937年，与服部之总合著《日本工场手工业史论》和《明治染色经济史》。1938年11月，以“违反治安维持法的嫌疑”被日本反动政府逮捕。次年出狱后，他继续从事历史研究，于1941年出版《后藤新平》，1942年出版《近代日本外交史》和《日本产业史序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担任产业劳动调查局理事长，并讲授日本经济史。1950年担任名古屋大学法学部教授，至1973年退休。其间曾出版《明治政治史》、《大政政治史》、《大正民主史》、《安保斗争史》、《战后日本政治史》、《日俄战争史研究》（合著）等书，并于1964年任日本政治学会理事长。

信夫长期从事日本政治史和外交史方面的研究，具有较深的造诣，有很多著作。1974年出版的《日本外交史》（合著），是他毕生从事日本外交史研究的结晶。他在书中热情歌颂中日友好，欢迎两国恢复邦交，对中国人民表达了友好的感情。

本书是作者在已经出版的几部关于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史的基础上，对多年来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概括和总结，运用材料比较丰富，分析也比较客观。全书共分四卷，重点叙述日本近代以来的政治史。第一卷以十七世纪初至十九世纪中叶德川幕府统治时

期为背景，阐述了日本封建社会后期经济的发展与阶级矛盾的激化，涉及内政、外交和思想等方面，并揭露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强制打开日本大门，使日本面临了沦为殖民地的危机。此外，在叙述中还注意联系中国的情况，与日本加以比较，并提出了他自己的看法。书中的一些分析虽然尚可进一步探讨，但全书毕竟可以作为我们研究这段日本历史的有益参考。

本书第一卷根据日本南窗社 1976 年 11 月版译出。为读者方便起见，译者作了必要的注释，并保留了书后的索引，还对索引中的日本人名等用拉丁字母试注了日文读音。由于译者水平所限，在译文、注释和注音中错误在所难免，恳切希望得到批评和指正。

凡 例

一、幕末维新时期的日本有许多名字，但本书不拘其各个时期使用的名字，均用通称。有时，象称呼山内容堂那样，不称其丰信这个名，而只取其号。无固定原则。

二、在提及人物的姓名时，第一次必定列出全名，但是对于欧美人，为避免烦琐，亦多仅用姓表示。全名及其拼音在卷末索引中列出。未列部分系不详者。

三、编制索引时，对朝鲜和中国的人名、地名，除如广东、上海等与原来读音相同者外，全按日文读音标出^①。这是因为有的人了解原来的读音，而有的人并不了解。

四、年号全用公历和阳历表示。阴历和阳历的对照，系根据外务省编《近代阴阳历对照表》（原书房，1971年）。

五、在正文叙述中，引用资料以“ ”标出；在引文中，（ ）内的文字系所引原文之注释，〔 〕内的文字系作者之注释。

六、为避免烦琐起见，原则上不注明引用资料的出处。在论点中也吸收了许多研究者的成果，对此，除特殊情况注明者外，一般从略。

① 此译本从略。

本书是我把近代日本政治史作为通史来叙述的四卷本《日本政治史》的第一卷。本卷主题为西欧的冲击与日本的开国。

本卷内容，叙述到新岛襄^①逃往国外的事件为止。在我关于开国过程的叙述中，新岛事件虽是这一过程的终点，但同时也是我进行分析的出发点。

福泽谕吉^②于1860年(万延元年)和1862年(文久二年)随同幕府的遣外使节分别访问美国和欧洲，亲身感受到西方的文明，便带着有用的知识，作为启蒙思想家而回到日本。他在1856年已承继了户主的身分，又于出外游历前后的1861年结婚，1863年得长子一太郎。

新岛襄为追求对基督教的信仰，于1864年(元治元年)乘黄昏自箱馆^③逃离日本，偷渡美国。他在致其父亲的信中，自称为“不忠不孝之子”。其父害怕幕府^④追究，便声称他“为学习海军而来到箱馆地方，但同年六月(1864年7月)离开该地不知何往，下落不明”，并以此为由，废除了父子继承关系。

幕府自1858年(安政五年)至1859年已与欧美五国签订了通

① 新岛襄(1843—1890)，日本明治时期的教育家，曾创建同志社和同志社大学。

② 福泽谕吉(1834—1901)，日本明治时期的思想家，曾创建庆应义塾和庆应义塾大学。

③ 箱馆，今函馆。

④ 幕府，日本封建社会中掌握全国权力的军事独裁政权(1192—1867)，首领称征夷大将军。这里专指德川幕府(1603—1867)，亦称江户幕府。

2 商条约，把日本引向了开国的道路。尽管如此，为什么到了五年之后的 1864 年，新岛襄仍不得不冒被废除父子继承关系之险而逃离日本，前往美国留学呢？在明治时期，福泽谕吉和新岛襄分别在东京和京都创办庆应义塾和同志社这样有代表性的私立学校，但他们两人的命运如此不同，这说明了什么呢？对于福泽来说，认为日本已经开国了，但对于新岛来说，认为日本不是仍然处于锁国的情况吗？这样的话，所谓开国又如何解释呢？本卷就是我自问自答的记录。

我的书桌上有两本开国史。一本是研究维新史的史学家石井孝氏叙述有关日本开国史的著作《日本开国史》（吉川弘文馆，1972 年版），另一本是在美国的中国学者徐中约氏叙述有关中国开国史的著作《中国之加入国际社会》（Immanuel C. Y. Hsi, *China's Entrance into the Family of Nations. The Diplomatic Phase, 1858—1880. Harvard East Asian Studies, 5,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把日本和中国之加入国际社会称为“开国”——正象本书所表明的那样，不要说中国，严格说来，就连日本也不是“锁国”，所以这种说法是不合适的，如果简单地姑且称之为“开国”，那么在石井孝氏与徐中约氏的著作中，不仅叙述的对象不同，而且在叙述开国史中所采取的方法亦有很大差异。

石井氏是把日本开国的过程作为“通过以英国为核心的世界资本主义而实现的世界市场形成过程中的一环”来加以观察的，并对“开国的历史意义”概括如下：

“这样，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为核心，在它的周围还有晚些时候才确立资本主义国民经济的美、德、法等国家，因而形成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在它的下面，则有作为世界资本主义商品销售市场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以及经济上的附属国。这就是我国开国时的世界资本主义

的结构。日本的开国，意味着日本被纳入到世界资本主义的体系之中。”(第3页)

这样，石井氏在《日本开国史》中便从“世界资本主义与日本的开国”谈起，正文中的叙述，始于美国军舰来航、缔结日美亲善条约，迄于决定日本开国的与五国之间签署条约，最后虽然展望了“开国与国内形势”，但他概括了开国的过程后得出如下结论：

“开国具有使日本作为世界资本主义市场而开放的历史意义。这个过程始于嘉永六年（1853年）黑船^①来航，安政元年（1854年）缔结日美亲善条约，经过安政五年（1858年）与五国缔结通商条约，至安政六年予以实施，遂趋于完成。”(第387页)

徐中约氏又是怎样叙述这个问题的呢？中国的开国史与日本的开国史有许多不同之点。如果说，使日本走上开国道路的是“黑船”的威力，那么使中国开国的则是鸦片战争和亚罗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这样实际的战争。如果说，日本是通过亲善条约和通商条约这两个划时代的条约而实现开国的，那么中国则是由结束鸦片战争而签订的南京条约而一举开国，并由结束亚罗战争而签订的天津条约使这一开国更为充分和完善。这样，中国和日本由于相继与西欧各国缔结了天津条约和通商条约（五国条约），就大体上步调一致地实现了日本的开国与中国的开国。徐氏所叙述的就是以缔结天津条约为中心的中国开国史的情况，其特点则在于重点叙述中国之“加入国际社会”这一缔结天津条约的结果。徐氏在其所著《中国之加入国际社会》一书的第一页上这样开始写道：

“‘国际社会’（family of nations）这个词具有比喻世界上的国家共同体的特点。在今天来说，它虽然与整个国际社会大体上是一个范围，但在当初，却只相当于1648年签署威斯特发里亚条

① 黑船，十六、七世纪，葡萄牙、西班牙等国船只来到日本，因船身大多漆为黑色，故名。此后相沿成习，对来自欧美各国的船舰通称黑船，直至江户时代末期。这里专指1853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培理率舰来日。

约^①的一批西欧基督教国家而已。国际社会的特点是它不断地从西欧膨胀开来。这个过程在初期的明显例证是，它于1721年把俄罗斯帝国包括进来，于1783年把美国包括了进来。在十九世纪，根据1856年巴黎条约^②的明确规定，随着土耳其的加入，它便侵入到世界的非基督教地区了。当西欧的国际社会发展到远东的时候，它就面临着在中国领导下的另一个国际社会(another family of nations)了。在这两个互相排斥的秩序(these two mutually exclusive systems)之间，便发生了冲突，结果便是中国的秩序被相继侵入的西欧秩序所吞食。我所打算进行的这个研究，就是从这个设想出发的。”

徐中约氏的著作名为《中国之加入国际社会》，石井孝氏的著作则名为《日本开国史》。如果对这两书直接加以比较，对作者自不免有失礼之嫌；但如果我是为了研究日本的开国史，从如何接受和运用他们的精心著作这一角度出发，则进行一定的比较也还是必要的。问题在于石井氏的方法。石井氏把日本的开国当作为“通过世界资本主义而实现的世界市场形成过程中的一环”来看待。因此，对于石井氏来说，日本向世界市场“开放”和被“纳入”世界市场，才是问题的所在，因而由于日本已经向世界市场“开放”和被“纳入”了世界市场，所以日本开国的过程便也就“结束”了。开国的主体是“世界资本主义”，日本则是被“纳入”的对象。从日本来看，被“纳入”是不是就是“结束”，换言之，无论日本是否以其本身为主体而“加入国际社会”，这些都不是开国史上的主要课题。世界资本主义的商品自由流入日本，日本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市场，这固然成为开国史上的主要课题，但日本商品是否

① 威斯特发里亚(Westphalia)条约，于1618至1648年的欧洲三十年战争后签订，它重新划定欧洲大陆各国的边界，开创了由国际会议解决国际问题的先例，并建立了欧洲新的国际均势。

② 巴黎条约，于1853至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后签订。

能够自由开辟世界市场，则又不是开国史的主要课题了。世界资本主义商人为开辟日本市场而来到日本，为了保护他们，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便派来了公使和领事，这虽然成为开国史上的主要课题；但日本商人为开辟世界市场，在日本与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自由往来，为了保护他们，日本政府派出公使和领事，这却又不成其为开国史上的主要课题了。那么，这样的开国史能够算是一部好的开国史吗？

如果说，根据五国条约使“日本作为世界资本主义的市场而开放”，尽管如此，五年后新岛襄却又碰上这种局面，即他如果不想办法逃往国外，就不能实现其留学美国的愿望，换言之，对于新岛来说，日本仍然处于锁国状态，那么，竟把“日本作为世界资本主义的市场而开放”当作开国过程的“结束”，不就是毫无道理了吗？至少，日本对于福泽谕吉来说是开国，而对于新岛襄来说却不成其为开国，那又怎么能把日本开国的过程说成是已经“结束”了呢？对这个矛盾解释清楚，不正是日本开国史上的主要课题之一吗？对这个矛盾解释清楚的方法，不正在于把石井孝氏叙述日本“开国史”和徐中约氏叙述中国“加入国际社会”的观点，作为研究开国史的方法而加以综合和统一起来吗？我在本卷的叙述中，就是以这种对于日本开国史的方法上的回顾而展开的。

徐中约氏指出，中国之加入国际社会，伴随着中国由过去的“儒教的世界帝国”(Confucian universal empire)变为“近代的民族国家”这一发展过程。儒教的世界帝国所建立起来的世界秩序是“华夷秩序”。与华夷秩序相反，日本德川幕府建立的秩序则是东洋学学者中村荣孝氏在其大作《日朝关系史》(三卷，吉川弘文馆，1970年版)中所指出的“大君^①外交体制”，本卷学习中村

① 大君，一般系对日本天皇的敬称。但这里指德川幕府的将军。

氏，把这个概念的表述与“华夷秩序”中的“秩序”一致起来，称之为“大君外交秩序”。日本在古代曾经从华夷秩序的旗帜下独立出来，具有这种历史的影响，儒学作为德川幕府官方所许可的意识形态，也带有华夷观念而具有影响，这样，在理解大君外交秩序时，就要以理解华夷秩序与华夷观念作为不可缺少的前提。然而，

6 本卷在叙述大君外交秩序之应付西欧的冲击时，对华夷秩序应付西欧冲击的情况也略作详细的论述，这不仅是为了更清楚地将大君外交秩序与华夷秩序分别对西欧冲击所采取的不同态度加以比较，而且想在日本与中国之不同的应付中，发现解决当年“工场手工业论争”的关键。

工场手工业的论争是围绕着历史学家服部之总氏于1932年把幕末日本的发展阶段规定为马克思《资本论》中所说的“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①而发生的论争。服部氏在1947年发表的《日本史上的世界与世界史上的日本》那篇论文中，这样概括地把幕末的日本规定为工场手工业时代的想法：

“……当我们从一国社会物质生产发展阶段的高低这一点来理解时，与十九世纪初期‘黑船’来航的幕末日本处在同一时代的朝鲜和中国，其情况就并不相同。我认为其不同点是，日本在天保^②时期——1830年代就已经进入马克思所说的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严格意义的工场手工业时期，而中国进入这个发展阶段，则是中日甲午战争的前夜——1890年代的事。中日两国虽然由于南京条约和安政条约的签订，在完全相同的情况下实现了‘开国’，但日本在中日甲午战争前靠自己的力量修改了不平等条约，因而能处于如〔冈仓〕天心^③所说的‘诚可谓自己取得独立’的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73页。

② 天保，日本仁孝天皇年号，时当公元1830至1844年。

③ 冈仓天心（1862—1913），曾任东京美术学校校长，并创建日本美术院，著有《东洋的理想》、《日本的觉醒》等。

‘唯一古老帝国’的地位，另一方面，中国这个古老帝国则处于不断的衰败中，其最根本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即使这两者所处地位的差别由于甲午战争而又有了决定性的扩大则另当别论，恐怕只能从‘黑船’来航时期两国处于上述发展阶段上的差别来加以说明。当年我在历史学上关于幕末为工场手工业时期的主张，实际上正是这个观点。”（《服部之总全集》，第10卷，1974年福村出版，第97—98页）

问题在于如何说明中国和日本是在“完全相同的情况下”实现开国的。如果把中国和日本的开国作为石井孝氏所谓的“通过世界资本主义而实现的世界市场形成过程中的一环”，并从这一抽象的意义上来看，倒也许可以说两者是处于“完全相同的情况下”。但是，两者并不相同，第一，中国（清朝政府）和日本（德川幕府）对待西欧的冲击所采取的不同态度，早在签订南京条约与安政条约的“黑船时代”以前的十八世纪末就已经表现得清清楚楚；第二，两者态度不同之原因，并不在于两国经济是否进入了工场手工业阶段这一“发展阶段上的差别”，而是在于面临西欧之冲击的两国的体制与秩序——华夷秩序和大君外交秩序——的不同。中国和日本在开国以后所走的道路迥然不同，中国成为西欧各国的“食饵”，而日本则能避免成为其“食饵”，其“最根本的原因”正是在于这面临西欧之冲击的所谓华夷秩序与大君外交秩序，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体制和秩序，在于这大君外交秩序先于华夷秩序而迅速采取近代化——由欧化而实现近代化——的政策。一度成为“食饵”的中国，在1931至1945年与日本帝国主义所进行的十五年战争中取得了胜利，恢复了“诚可谓自己取得独立”的自由，而一度曾把这个“不断衰败的古老帝国”当成“食饵”的日本，则在十五年的战争中遭到失败，名誉扫地，追溯其原因，也与其对西欧的冲击所采取的不同态度以及实行近代化的作法有关^①。我在本卷中，一直上溯到十八世纪末叶，详细叙述华夷秩序与大君外交

秩序如何对待西欧的冲击问题，目的在于想要解决曾与我多少有些关系，因而也就负有一定责任的工场手工业的论争问题，以履行自己的这一职责。

- 8 我跻身学术界已四十余年，为了对从事学问的一生作一清算，便开始写作本书，只是感到自己积累所得的知识仍然太少。有好多位先生关心我的研究工作，至今仍得到他们的盛情关怀。我对各位的盛情关怀表示衷心感谢——这些感谢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并将本书献给读者，希望得到批评指正。

信夫清三郎

1976年5月18日

① “学者们‘科学地’论证了中国在近代化方面如何落后于日本的问题。也可以说是确立了科学的轻蔑感，以代替那朴素的轻蔑感。”“中国的近代化与日本相比，表现出不同之点。”“关于这一点，丸山真男所著《近代日本思想中的国家理性》（《展望》1949年1月号）一文在方法论上对我亦有启发。……他在论及中国的近代化所以落后于日本的原因时，曾举出华夷思想这个概念。他认为，由于中国的华夷思想是固有的，所以大大妨碍了国家理性的产生，而日本则不然，由于它的思想是从中国借来的，所以不仅这种思想的抵制本身是软弱的，而且相反它却还可以转化为确立近代理性的杠杆。我以为，这是卓越的见识，它使过去为人们所忽略的东洋近代化问题增添光辉。然而，我仍有不能满足之处，丸山虽然从意识形态方面圆满地解释了中国在近代化方面落后于日本的原因，但我认为，他还只是把这个落后仅作为一般的落后来对待，而没有观察到时间的差别同时还包含着质的差别。把后进国的近代化过程与欧洲明确地加以区别，这种作法当然比过去那种教条的唯物史观论者要高明得多，但他不是还忽略了同属后进国类型的日本与中国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差别吗？”“与此相对照，我想起了约翰·杜威的中国观。……与丸山使用华夷思想这个概念一样，杜威也采取了同样的说明方法，但不同之点在于，杜威认为中国的近代化虽然在时间上落后了，但同时却使其在质的方面占了优势。他在1918年就已经认为，‘中国尽管在各方面有其落后性、混乱与软弱，但在为西方近代思想所渗透这一点上，却远远超过了日本’。”“为什么中国的近代化取得成功，而日本却失败了呢？……”（竹内好：《日本与亚洲》，《竹内好评论集》第3卷，筑摩书房，1966年，第57—62页）。——原注

目 录

9

凡 例

第一章 锁国	1
第二章 西欧的冲击	62
第三章 内忧外患	124
第四章 开国	194
第五章 攘夷	275

索 引	342
-----------	-----

倾我国所产足以流传万代宝货，
而易来自远方一时之奇技淫巧，因此
货利之事而致损我国威，窃以为实属
不当。

——新井白石，《砍柴记》

正当英国实现了光荣革命^①的1688年时，中国的清朝是在圣祖(康熙帝)的统治之下，而日本则是在德川幕府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的统治之下。关原之战^②发生于1600年，德川家康成为征夷大将军而在江户^③开设幕府，是在1603年，所以德川幕府的统治到这时已将近一个世纪了。清朝灭亡明朝，进入北京，是在1644年，因此清朝的统治到这时也快半个世纪了。建立幕府达一个世纪的日本和建国半个世纪的清朝，分别迎来了元禄^④和康熙这样富于创造性的时代。

幕府对大名^⑤的控制和对人民的统治，看起来似乎还没有丝毫动摇。但是，在繁荣的背后，幕府已开始暴露出内部的矛盾。幕府在升平中穷奢极侈，糜费了德川家康留下的大量储备金和从

① 光荣革命，指1688年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发动宫廷政变，最终确立了君主立宪制的资产阶级专政。

② 关原之战，德川家康打败石田三成，是德川氏推翻丰臣秀吉政权的关键一仗。关原位于今岐阜县西南部的不破郡，是京都的门户。

③ 江户，今东京。

④ 元禄，日本东山天皇年号，时当公元1688至1704年。

⑤ 大名，被分封统治一个藩国的国主、城主，掌握所辖地区的军政大权。

直轄矿山中开采出来的大量贵重金属,或因大火——1657年的“振袖”火灾^①——而烧毁,开始为深刻的财政危机所苦恼。幕府为了节省在对外贸易中用于支付的贵重金属——金、银、铜,不断地强行实施对贸易的限制。在锁国期间的1685年,限制了只被允许
4 在长崎通商的唐船(中国商船)和荷兰船的贸易额,1688年限制了唐船来航的数量,1715年限制了两国船只的数量与进口额。

幕府对贸易的强行限制,只是幕府单方面发出的通知。无论是唐船或荷兰船,不论其允诺与否,均必须遵从。167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遣“归来号”船前来要求通商,也被幕府强行拒绝。幕府从财政的危机中已经开始暴露出各种矛盾,但它的统治在坚持锁国的条件下,看来似乎仍平安无事。

一个世纪以后,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以英国发明家约翰·凯伊于1733年发明飞梭织布机为开端的产业革命,从1760年代至80年代有了飞跃的发展。1776年,亚当·斯密写完了《国富论》。同在这1776年,美国完成了争取独立的革命。1789年,法国则开始了市民革命。所谓“革命的时代”,其内容就是英国历史学家E·J·霍布斯鲍姆所说的“产业革命”和“政治革命”这样的“双重革命”(dual revolution),于是,在西欧就产生了资本主义社会。这时,清朝是在高宗(乾隆帝)统治之下,正处于法国革命高潮时由英国遣使清朝的马嘎尔尼^②曾比之为“所罗门的荣华”^③的绚丽豪华的时代,日本则是在德川第十代将军家治和第十一代将军家齐的

① “振袖”火灾,“振袖”是日本古时穿的长袖和服。1657年1月,据说由于寺院举办水陆道场,焚烧“振袖”而引起火灾,江户的大部分地区被烧毁,死者达十万八千人。

② 马嘎尔尼(George Macartney, 1737—1806),英国外交官。1793年奉英政府命,以庆祝乾隆帝八十寿辰为名前来中国,要求增开通商口岸,减低税率,给予租界,并派公使常驻北京,遭清政府拒绝。

③ “所罗门的荣华”,所罗门(Solomon)是公元前十世纪的以色列国王,在位时因发展商业获利,并大兴土木建筑,以其穷奢极侈而有“所罗门的荣华”之称。